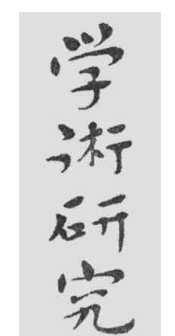


接见时在座的，有林海云、刘希文、侯野烽等。几内亚驻我国大使卡马拉·马马迪也在座。



第一〇八期

吴略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引证史料，对姚文元同志反驳了一通之后，终于谈到了《海瑞罢官》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把《海瑞》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剧本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

这就是吴略同志作为创作思想的所谓“自我批评”！

《海瑞罢官》真的就错在这三点上吗？不对！这三点结论，貌似问题，其实是在回避实质性的问题。

先看第一点，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可不可以作为历史剧的主题呢？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不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题材，但我们并不反对它去描写它。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通过这种描写正确地反映历史，有什么不好呢？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明末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至少应指出以下几点：第一，斗争的双方都是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们的矛盾和斗争，都无损于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这是一个封建王朝衰落腐朽的时期，无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具有何种性质和表现着不同的形式，都无力挽救封建王朝的必然灭亡。第三，这种斗争不代表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又同当时的基本矛盾，即日益尖锐，正趋于总爆发前夜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吴略同志是怎样看待和描写当时的基本矛盾的呢？他说：“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士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士官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士官的阶级矛盾。”所以，他认为如果写了“农民对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好像就算正确了。难道知道，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和士官的矛盾，只是同部分地主的斗争，这个斗争当然也是很激烈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只承认农民与士官的矛盾，而掩盖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矛盾。如果吴略同志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即使写的“是农民对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也仍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仍然会成这种或那种错误。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姚文元同志认为：“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奸官’多少‘清’，多少‘奸’，他们毕竟只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奸官’，而不可能相反。”这当然是对的，只要是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不论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统统都是那么号货色吗？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给历史以一个科学的定位”呢？因为古代的史书，姚文元同志早给确定好了，都是半斤八两，一钱一秤。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用来“麻痹农民的思想”，“掩盖统治阶级本质的工具”，“是剥削阶级的伎俩”，“当作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照此看来，“清官”比贪官类要更坏了。因为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会更快地引起农民的反抗，掀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而“清官”的改良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延长了统治阶级的寿命。可是，这会出现什么结论来呢？既然贪官污吏要比“清官”好，那么，且从历史上看是贪婪暴虐的贪官污吏，而农民只好不停地忍气吞声起义好？但是在封建社会，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又不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得到彻底胜利，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请问，照此办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发展了，封建社会的这一段历史又应向何前进？

抚杀“清官”的阶级本质，甚至把“清官”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救星”，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但是，姚文元同志说：“清官”，“贪官”二者而观，食言否定，甚至把清官说得比贪官更坏，恐怕也是不正确的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它究竟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的，对于封建社会上的“清官”，也不应该这样看？海瑞在当时抑制兼并，打击豪强，退田（姑且就按姚文元同志的“考证”，因是退给了中小地主和富农），平冤狱，修治吴淞江，难道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民和经济没有好处吗？列宁在《民粹派的经济学内容》一文中说：“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完全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这些措施中的某些（虽然是很不重要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很微不足道的）改善”。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的这些局部的改良，对于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很不重要的）好处，为什么要攻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完全否定”呢？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姚文元同志批评吴略同志把海瑞的“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我看，这个批评并不事实。吴略同志在《海瑞罢官》中就有这样说过。相反，他在《论海瑞》一文中却明确地肯定道：海瑞的不屈不挠，言行一致，刚直不阿……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姚文元在社会制度上有原则的不同”。这一点，姚文元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而且，姚文元同志不认为，古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譬如“刚直不阿”，“不畏强暴”，“言行一致”，“敢于承认错误”等等，都是属于他们的阶级内容，而不能“抽象”地看，其具体内容是肯定，这些“刚直不阿”，“言行一致”……等等，都是属于封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统应该摒弃，万万学不得（那怕是首先要进行批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难道古人就这么一无是

《海瑞罢官》的艺术表现错在哪里？

吴荫循

提要 吴略同志所承认的《海瑞罢官》创作思想方面的三点“错误”，都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

- 一、问题不在于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在于吴略同志对当时的基本矛盾的看法是错误的，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抹煞调和了农民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 二、问题不在于把海瑞“突出得过分”，而在于歪曲了海瑞的阶级本质。
- 三、海瑞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应美化，而是什么表现单干、突出个人的问题。剧本突出海瑞的不怕孤立的单干精神，是为了鼓励孤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略同志言不及义地“承认错误”，正是掩盖真正错误的烟幕。

何况吴略同志所说的农民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吴略同志关于苏松地区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从那里土地兼并严重这一情况推论出来的。正如有些同志指出的，土地兼并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到海瑞那里去告状的也主要是这些人。海瑞所说的“民”主要也正是指这些人，他的“爱黎如子”、“为民请命”实际上就是代表这些人要地主作些让步，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吴略同志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当时的矛盾，反而抹煞农民和整个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又把中小地主和富农当作农民，这样他就在《海瑞罢官》里，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海瑞荒唐地写成了农民的代表，凭借皇帝颁发的大印、凭借“三尺皇法”保卫了农民的利益。吴略同志画出了一幅奇妙的图画：矛盾的一方是乡官徐德，另一方是清官海瑞，海瑞的身后站着一大群农民团结的农民，还有一个身穿龙袍的皇帝，而这三者又是如此和衷一致，似乎只有王法神榜，海瑞胜利，农民也就幸福了。在这里，突出了海瑞和徐德之间的矛盾，而农民和海瑞的矛盾，农民和皇帝，整个封建王朝、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却被剧本一笔勾销，无影无踪了。许多同志的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出戏美化和歌颂了封建统治阶级，调和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问题的实质。可是吴略同志避开这些，不承认他的观点和立场的根本错误，而说什么他的“错误”只是“该写海瑞和海瑞的内部的矛盾，这难道不是错误吗？”

再看第二点。吴略同志认为剧本错误在于“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照这个说法，海瑞本来是“高出”了，只是剧本写得“过分”了一点，也就是夸张得过头了一点，才出了毛病。事情是这样的吗？

如果海瑞真是一个伟大的人，那么，在剧本里夸张一点，突出一点，又有什么错呢？艺术创作从来允许夸张的，很多优秀剧本对它的英雄人物也往往是夸张地，突出地加以歌颂的。但是，夸张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典型性格的基本原则。夸张是为了使艺术形象比生活中的原型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概括意义，更鲜明深刻地把，没有一点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吗？毛主席说过：“我们中国人民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应当正确估计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要求我们“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对于这些，姚文元同志又该作何解释呢？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姚文元同志在自己论据不足时，就靠猜测，钻牛角尖，主观想象进行推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以达到诋毁的目的。现举一例说明。书上记载，海瑞死后，“小民罢市，筑江上，白衣冠送者，盈门而哭，百里不絕”。吴略同志据此认为当时广大人民是尊敬和热爱海瑞的。姚文元同志为了驳倒这一点，证明海瑞并没有得到“真正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竟然作出如下的推理：“只要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服，自己家里没有亲人，没有衣服穿，就知道那时那里穿什么体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海瑞和富农商人中的某些人。”好一个“想一想……就知道……”！屈原难道没有我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他投江自尽自杀后，广大人民在每年五月初五日的龙舟竞渡（竞渡），缚粽子来表示悼念。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种“想一想”，在解放前（具体一点，古代）广大人民自己吃粥都感到困难，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划龙舟，那有心情去划龙舟呢？而且还是上好的粽叶划到江里喂鱼呢？那么，岂不是“就知道”“那时那些热爱海瑞的人”，“决不是”“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也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也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

显然，只要人们“想一想”，“就知道”姚文元同志这种立论是没有道理，站不住脚的！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姚文元同志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什么《海瑞罢官》要我们去学“退田”“平冤狱”等等。这种理解，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姚文元同志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小朋友，看了《三剑客》就拿起来格杀去格杀，难道看了《海瑞罢官》就要去扯着公社社长去嚷嚷“退田”，抱住法院院长的大腿去嚷嚷“平冤狱”？

姚文元同志认为分析一个作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谈。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可是，姚文元同志据此把《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断定《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动派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这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只要认真地读《海瑞罢官》谈一谈，想一想，就知道“退田”、“平冤狱”并不是该剧本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不过是以渲染海瑞的部分情节而已。显然不能作为剧本作者是要我们去学“退田”“平冤狱”而去搞“单干”风、“闹”翻案”去。进一步而论，《海瑞罢官》中向海瑞组织人民修吴淞江等情节，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去认为这是要人们在困难时期去兴修水利、防治水灾、克服困难的呢？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一撤海瑞，撤掉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因而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阶级敌人疯狂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民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本写作者的主观意图，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揭示人物的阶级本质和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更好地展示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夸张和突出海瑞的什么呢？它夸张地、突出地刻划海瑞这一形象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吴略同志在剧本中把海瑞写成农民的代表，突出地表现海瑞如何“为人民”操劳，以此来说明海瑞是农民的救星。把地主阶级代表、统治集团的官吏，说成是被压迫者的救星，这只能说是一种极片面的、毫无阶级观点的胡诌。这已经远不是什么艺术上夸张、突出的问题，而是歪曲人物的阶级本质，歪曲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宣扬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了。

吴略同志也许要反驳说，剧本不是也“强调了”海瑞维护国脉拯亡的思想吗？他在“自我批评”里摘录了许多这方面的唱词，分明就是反咬批评他的人，可惜的是这些唱词并不了吴略同志的账。剧本写海瑞的慈悲思想，却并没有揭示出他是封建王朝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恰恰相反，剧本告诉人们，为皇帝和为农民是一致的，海瑞越维护封建王朝，农民就得到真实利益。在这里，被美化和歌颂的岂止海瑞一人而已？更荒唐的是，剧本不但大写海瑞如何赐给农民“何思克灾”的“好光景”，而且最后还编造了一个死无对证，以胜利英雄姿态下场的情节。美化海瑞的一些反党措施，难道不是在宣扬改良主义吗？难道不是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唱反调吗？吴略同志海瑞说成什么“过分突出”、“过于高大”，只不过是建立错误的一钱一秤来攻击罢了！

再看第三点。吴略同志说《海瑞罢官》错在“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虽然，这也有些是事实，但是也没有要吴略同志赋予于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谁也不打算计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个人单干些什么？

如果是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在保卫祖国方面或者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祖国文化发展方面有过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之中不少出身于剥削阶级，甚至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我们也不反对对他们个人的作用作

驳《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论

邵鼎勋

提要 陆南先生认为，海瑞站在民的一边与官进行“退田”的斗争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陆南先生也认为“退田”斗争只有利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所以“难能可贵”这一赞词显然出于他之口。

陆南先生认为，海瑞在“断案”时超起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在这里，陆南先生把仁政主义思想说成是一个“超阶级”的东西。陆南先生认为，海瑞得到前朝旧臣的人歌咏，因而不只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事实上，歌颂海瑞的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所有这些，都说陆南先生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的。

读了陆南先生的《〈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一文，我颇不注意地读。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

海瑞的斗争究竟对谁“是难能可贵的”？

陆南先生一开始就承认“海瑞说的‘民’是没有做过工”，人民，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然后肯定地说：“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毫无问题，“官”和“绅”有权有势，一般没有做过工。“民”的中小地主和富农是站不过他们的，现在忽然有一个“小民”的海瑞出来反对中小地主和富农“打抱不平”，要替他们“退田”，那末，这批中小地主和富农要看到自己的旧产“失而复得”，当然就会从内心上感激。因此，“难能可贵”这一赞词显然发出于当时中小地主和富农之口，同贫无立锥之地之农民群众是丝毫也不相干的。但是，陆南先生竟诘问道：“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竟是谁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陆南先生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的？如果在海瑞所使用

的“我们得想一想”这一追问口语中我们的“两手”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那么当然我们的自由——你究竟怎么想怎么想。但是，是要你劳动人民“想一想”，那末“我们”劳动人民就同你的想法不一样——劳动人民的想法是，只有农民群众在封建统治的压榨下不翻身起来斗争，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陆南先生认为，“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一谈”。据他说，这是因为“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而“海瑞却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民’的利益”。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海瑞有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而在于他的政策和措施是不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既然海瑞的“退田”只是为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那末在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看来，在今天无产阶级起来，他实在谈不到有什么“价值”。

陆南先生一口否定海瑞的措施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认为他的“退田”斗争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从而帮助农民起来争取中小地主和富农组成一个“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这真是一种奇谈怪论。第一，陆南先生既然承认海瑞说的“民”是指中小地主和富农，为什么又否定海瑞为这些人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呢？第二，官僚地主固然也迫害中小地主和富农，但根本的还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就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群众的那条来说，中小地主和富农同官僚地主相比，实在没有多少质的区别。如果陆南先生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话，为什么那么美化那些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清官”呢？第三，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封建专制制，封建王朝之所以需要设立海瑞这类之类的官员去“弹劾”贪官污吏，只不过是贪官污吏的行为超过了这个制度所允许的剥削制度，斗争理论大相霄壤吗？

出适当的评价，肯定他们的贡献，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于人民的東西。

海瑞是个什么人呢？不过是一个封建官僚。他单干些什么呢？不过是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他对历史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对于海瑞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去美化他，而不是什么表现单干、突出个人的问题。试问，如果吴略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的的那样，去大力表现海瑞的社会贡献，描写他的集体活动，难道就不是宣扬阶级调和、改良主义吗？如果表现海瑞走群众路线，而农民群众也支持他维护封建王朝的改良措施，这也不是对当时的农民群众的阶级大污蔑吗？

当然，剧本把海瑞写得孤立是另有原因的，这里头藏着比个人英雄主义远为见不得人的货色。《海瑞罢官》的主要是“要害”，联系它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正是通过海瑞的被罢官同情于当时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剧本越是把海瑞写得孤立，不宽容于社会，最后被迫害零等地罢官而去，就越强烈地发泄了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同情；同时，它越卖力歌颂海瑞不怕孤立的单干精神，也就越是给陷于孤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鼓励他们一意孤行地单干下去。这难道只是什么“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吗？吴略同志这样说，只不过是企图把政治问题轻轻化作小小的思想问题罢了。

总起来说，《海瑞罢官》的错误是根本性的立场错误，但是吴略同志通过上面的三条结论，却把结论解释成艺术表现上的和思想上的问题。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吴略同志在“自我批评”的结尾，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引用了毛泽东同志批评五四运动的一段话，用来解释自己的错误，说什么自己所以犯错误，是“形式主义的错误问题”，“没有一分二三分的科学分析方法”。当然，吴略同志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但是，《海瑞罢官》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只讲优点，少讲缺点不缺点”的“形式主义的错误”，还需要提到，五四运动虽有形式主义，但它起了坚决的反对封建神权、封建礼教进行了不受妥协的斗争；而吴略同志却在美化封建制度，歌颂海瑞这样一个封建王朝的忠臣贤大夫，为一小撮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充当护身符，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恶毒的毒箭。这岂不是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所能掩盖得了的？

在“自我批评”里，吴略同志也不得不说“立”场错了，“是立场性质的错误”等，但错在哪里，始终含糊其词，吞吞吐吐。吴略同志既然谈到了立场问题，那么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写出那个剧本？要让它发挥什么作用？现实政治作用？自己和谁站在一起？拥护谁？反对谁？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吴略同志何其讳莫如深！他像承认的“立场问题”，转眼间又具体地否认了，反过来还极力表白他的立场没有问题，仔细分析吴略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三点“错误”之后，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急忙“得出”的三条“结论”，正是掩盖真正错误的结论。但是吴某力表白：人们不禁禁要追问，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何必那么着意地隐瞒心迹呢？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原来是一篇言不及义的低级稿。

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当《海瑞罢官》所宣扬的阶级调和论遭到猛烈批判时，陆南先生就不自觉地赶快跑出来“打抱不平”，企图以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把《海瑞罢官》包得天衣无缝，不致弄巧成拙。

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和朱明王朝的法律，同为当时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积极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陆南先生这样，把吴略同志的观点弄为更谬误的地步。

“前朝后代的人”是不是“真正歌咏‘海青天’”？

陆南先生对于“海瑞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正确结论，感到很接受。他反问道：“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这个结论吧，那么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他以为这一诡辩曲的问法就可以把对方难倒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是始终难不倒的。

应该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是存在着的阶级差别。既然海瑞所说的“民”是指中小地主和富农，那末歌颂海瑞的“民”当然是站在中小地主和富农上。封建统治阶级从来就把自己冒充为全体人民的代表。现在陆南先生居然把地主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等量齐观起来，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完全违反科学论的说法吗？

即使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那也并非不奇怪。几千年来，这种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它不可能对一部分劳动人民发生影响。这部分劳动人民受到空洞廉价的诺言所诱惑，一时随声附和，对于那种最准确地反映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最能代表他们的真实利益的思想反而排斥、难于接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与不等于说，所以如此，是真正“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不然，就不会有农民群众的利益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之所以会喊一声“海青天”，不过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一段历史条件，认识不清不清楚而已。

不错，如陆南先生所说，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对当时的现实“苦于无限的幻想”，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幻想主要的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鼓动的。他们为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不能不在群众中间制造种种神秘和种种幻想，同时他们不得不狡猾地求助于一部分农民没有觉悟起来的群众之同情。而他们的吴略先生、陆南先生竟然如此轻描淡写，把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动的幻想加以宣扬。难道你不觉得你自己正是充当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吗？

在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时，必须牢牢记住列宁所说的一段话。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的职能：一种是自己统治的职能，都需要有律师的职能；一种是自己镇压被压迫的反抗和镇压。教师、官吏镇压着学生，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危险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痛苦，使他们甘愿革命行动，从而使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〇页）各种有史料材料来，海瑞这个“清官”，在更大程度上是执行了教师的职能。从刽子手的功能，并不准；镇压教师的虚伪面，就比较不严重。这就是有一部分“前朝后代的人”把“清官”所鼓吹的“海青天”也就是“海瑞”——“海青天”中“经不起”的漏洞。不去识破海瑞的虚伪面，不去认清海瑞的真相而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本质的，这就不说不上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

